

## 國境之西

### ——論南朝作家鮑照、謝朓與蕭繹的荊州書寫\*\*

祁 立 峰\*

#### 摘 要

過去談及「南北朝」文學，「南」、「北」文學的分別較受論者的關注。然而就南朝而言，荊揚地理有異，風俗有別，自然形成不同文風。荊州自三國時即被認為是江南王國的「國之西勢」，而本文從「荊州書寫」的角度切入，舉列三個曾於荊州寓居任職的作者：鮑照、謝朓與蕭繹。對鮑照來說，行旅江、荊州郡的經驗，與之擬代樂府的邊塞羈旅風格結合，成了可移植的經驗；對謝朓來說，荊州是與建康對照的空間，而隨著日後的懷想荊州，荊州時光伴隨著典故反覆被召喚；對蕭繹來說，荊州的仙靈傳說與他的浪漫情懷結合，造就其荊州情結，荊州也成了他精心所打造的私我王國。藉由荊州書寫的探討，期能補充南朝文學「東西」的差異，填補「南北」之不足。

**關鍵詞：**南北朝、荊州、鮑照、謝朓、蕭繹

---

2014 年 3 月 3 日收稿，2015 年 2 月 4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7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為筆者科技部專題計畫「國境之西：論南朝作家的荊州江州書寫」（NSC 102-2410-H-005-054）之部分成果，又本文修改時獲審查人的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 一、前言：界定「荊州書寫」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sup>1</sup>

### （一）南朝的「西」與「東」

我們談及南北朝文學這個範疇時，「南方」與「北方」是最顯著的差別。而此差別的建構有其形成的過程與標準的區辨法則，如魏徵在《隋書》中所作的分判。但而若回到南朝地理與政治場域，當時南人所關切的「東人／西人」、「荊揚之爭」<sup>2</sup>或「分陝」<sup>3</sup>——其所觸及的「東方」與「西方」，就相對沒有受到太多重視。然而古典文學與空間密不可分，寓情於景，空間往往即是情感的載體。故本文聚焦南朝作家的荊州書寫，以書寫荊州、旅寓荊州時期所作、出於緬懷或受到荊州地理空間召喚而書寫的作品為探討內容。

西漢時設「荊州」，涵蓋了今中國大陸河南南陽以至於湖南、湖北全境，《晉書》〈地理志〉稱舜立十二牧，而荊州居其一：「《周禮》：『正南曰荊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荊州』」。<sup>4</sup>至漢則荊州正式成為行政區，大致涵蓋今河南南陽以南以及兩湖全境。荊州地處要衝，自三國即受到各諸侯重視，三國時荊州屬劉表勢力，劉表死後其子劉琮降於曹操。劉表還在世之時，東吳的重臣甘寧就曾對荊州的地理形勢以及未來局勢發展提出建言：

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 
- 1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76 〈文學傳〉，頁 1730。
  - 2 從東晉永昌元年（322）的王敦之亂起長達百年，荊州軍事勢力不斷成長，爾後劉裕篡東晉，藉分割荊州郡縣幅員以削弱其勢力，且以宗室領荊州刺史，以節制其力量。
  - 3 南朝時常稱荊、揚刺史為「分陝」，典出於周、召公分主陝東、陝西之故，《顏氏家訓》，卷 3 〈勉學〉「上荊州必稱陝西」，王利器注曰：「蓋東晉以後，揚、荊兩州刺史，膺分陝之任，故荊州有陝西之稱。」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202，204。
  - 4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5 〈地理志〉，頁 453。

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sup>5</sup>

相對於益州險阻，蜀道之難，荊州即適宜作為「國之西勢」。之後劉表病死，魯肅則說若據荊州則「帝王之資也」，<sup>6</sup> 建議孫權應趁勢經略荊州。而此論與爾後東晉何充面對庾氏家族佔據所發之論，頗為相似：

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sup>7</sup>

即便從這些軍事、家國或地理山川險峻之論，我們也可以看出，荆楚位在相對於揚州建康的邊陲邊疆，但同時卻又因「戶口百萬」、「士民殷富」等理由受到重視，成為江南帝國的「國境之西」，足以與揚州、建康所代表的「南朝中心」分庭相抗。有了政治、軍事和經濟的資源，再加上南朝獨特的州府僚佐雙軌制，<sup>8</sup> 許多南朝士人得以於建康以外的江州、荊雍地帶活動、旅寓，從此地到異地，空間變化也影響了作家善感的心靈世界。且「荊州」相對建康而地處邊緣位置，因而發展出與建康不同的空間氣氛與人文環境，這種「地方感」的差異既是真實地理學意義，也是人文地理學意義，並進一步影響文人心態。<sup>9</sup>

5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55〈甘寧傳〉，頁 1292-1293。

6 晉·陳壽，《三國志·吳書》，卷 54〈魯肅傳〉：「夫荆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頁 1269。

7 唐·房玄齡，《晉書》，卷 77〈何充傳〉，頁 2030。

8 關於「州府雙軌制度」，大抵是指州官和府主分別任用官員，漢時州佐吏只有刺史自辟之別駕治中這個系統，到了魏出現參軍。而到了南朝時期，州刺史多半加將軍之號，所以州府得以有兩批幕僚人馬擔任，相關論述筆者參酌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頁 154-180。王文進即認為，因此新行政制度的實行，造成非本籍的士人得以流動，形成不同的文學風貌，參酌氏著，「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8），頁 35-57。而筆者的論點同樣立基於此制度，只是從空間作為主體來說，當作者有了荊州履跡經驗，他們也自然受到此地的召喚與影響，無論是風格、文體或經驗移植。

9 在後現代視域中，研究者開始重視過去被壓抑或視為「邊緣」的概念、地方與文本。然而荊州不僅是相對揚州建康的邊緣，其自身有一漫長的歷史文化建構。除前面提過

如前述，過去談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談「南／北」差異者較多。近年學者始對南北之說有所反思——包括認為南北文學觀存在著「假性結構」；或認為南北文化不過是互相想像與定義的「文化他者」。<sup>10</sup> 筆者從此觀點希望提出另外一個課題即是——南朝作家如何認知自身所身處的空間？過去王文進曾從邊塞、山水兩種文學體類，談出兩種文化符號與心理認同的「欣於所遇」，<sup>11</sup> 然而從更細節的地理差異來說：屬於南朝內部的「東／西」概念，或與身分、地域認同有關的「東人／西人」，是否也應是我們觀察南朝作家書寫的面向之一？<sup>12</sup> 因此，筆者從「荊州書寫」出發，選舉三位作品數量豐富且皆有荊州任官、行旅、宦遊經驗的作家，談他們詩歌辭賦中的荊州意象，或荊州經驗如何給予他們的寫作滋養，反映於其題材、性格以及整體作品所呈現的「地方感」。<sup>13</sup>

## （二）三位作家的「荊州經驗」

鮑照最重要的政治經歷即是進入劉義慶文學集團，與袁淑、陸展、何長瑜等當時重要文人一起編纂《世說新語》，《宋書》提到劉義慶原本亦善騎術

---

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民生意義，水陸要衝、國境要塞之外，荆楚自古有其感傷憂患、旖旎而夢幻的諸多文學傳統。這些文獻、典故、傳說或史實無論遠近古今，必然影響了南朝作者，而作者受此地方感氛圍召喚，或反過來利用了這樣的邊陲傳統，製作另外一種屬於南朝「西方」的文化語境。

- 10 「假性結構」是王文進於《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中的說法；而「文化他者」則是田曉菲於《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的切入點。
- 11 王文進，〈南朝文人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論邊塞詩的「大漢圖騰」與山水詩的「欣於所遇」〉，收錄於氏著，《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頁 239-262。
- 12 這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包括侯景亂後以「西人」之姿堅持定都江陵的宗慄所撰的《荊楚歲時記》，據清·永瑆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此書皆記楚俗，當即其人……載（宗）慄自序曰：『傅元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敘，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宏。率為小說，以錄荊楚歲時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頁 1520。
- 13 關於「地方感」此說，筆者參酌了柯蘭（Mike Crang）的說法：「文學不因其主觀性而有缺陷；相反地，主觀性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社會意義。」氏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頁 58-59。

武藝，<sup>14</sup>及長而就文藝，「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sup>15</sup>在江州時期鮑照寫下稱之爲「廬山四詩」<sup>16</sup>的〈登廬山〉、〈登廬山望石門〉、〈從登香爐峰〉等著名詩篇。

有學者認爲鮑照出仕乃是隨劉義慶至荊州，<sup>17</sup>若此說爲確則後文所論的〈擬行路難〉或〈建除詩〉多少都移植了這種奔波的經驗。不過關於鮑照的荊州經驗，更確切與劉子頊有關。大明五年（462）歷陽王劉子頊封爲臨海王，隔年任荊州刺史，鮑照爲前軍行參軍隨赴荊州。此行前夕鮑照作〈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經翻車峴、黃鶴磯亦有詩。注者認爲此行非鮑照所願，故辭多鬱結。<sup>18</sup>其赴荊心情或許難以斷定，但鮑照即送命於荊州。據《宋書》：

荊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荊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道預、記室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子遺，執子頊以降。<sup>19</sup>

晉安王劉子勛叛亂時，子頊爲從亂，當時鄧琬等人與子頊曾有奔益州之議，不過因州郡各有勢力割據而作罷。對子頊僚佐而言，「荊州」成了他們版圖的極西邊界，「雖復欲西」亦不可得了。據繫年，鮑照於荊州作〈謝尚書莊聯句〉、〈採桑〉、〈代挽歌〉、〈代門前有車馬行〉、〈蒿里行〉、〈蜀四賢詠〉等，<sup>20</sup>大抵

14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51〈劉義慶傳〉：「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頁 1477。

15 同上註。

16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欲學明遠，須自『廬山四詩』入」，頁 169。

17 丁福林《鮑照研究》有「鮑照初仕之地點在荊州而非江州」一節，認爲過去學者受《宋書》〈劉義慶傳〉誤導，事實上鮑照於元嘉十二年（435）往荊州求仕，丁亦提到段熙仲〈鮑照五題〉（《文學遺產》1981.4: 107-113）的相關辯證，無論其說，鮑照少年時確有往返荊、江州的經驗。見丁福林，《鮑照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 23-26。

18 此參黃節，《鮑參軍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17。下文會再論及。

19 梁·沈約，《宋書》，卷 84〈鄧琬傳〉，頁 2144。

20 吳丕積，《鮑照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 40-44。

以擬代、遊戲爲主，像江州廬山書寫中的仙靈仙境或與集團領袖劉義慶的酬和、頌德、政治寄託等內容，已很少出現於此時期詩歌中了。

謝朓僅有三、四年的荊州經歷，然而荊州時光卻爲他詩歌的重要風格奠基。永明五年（487），蕭子良於雞籠山開西邸，招攬天下文士，當時重要的作家皆參預其事，謝朓也在其中，當時謝朓二十四歲，<sup>21</sup> 也就是此時期，謝朓與沈約、王融等人開創文學史所稱的「永明體」。永明八年（490），謝朓受蕭子隆邀請，離開建康前往荊州，任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當時謝朓二十七歲，雖然爾後謝朓又任宣城太守、尙書吏部郎等，並非長期寓居荊州，但若由後視昔，永明八年謝朓加入隨王文學集團的事件，改變了謝朓爾後的人生際遇。

隨王賞愛謝朓才華，史傳裡「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sup>22</sup> 的記載很著名，也表現了謝朓此時期的遂意。而這引發王秀之的妒嫉，於是齊武帝蕭蹟召謝朓還都，永明十一年（493）謝朓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也就在同年齊武帝蕭蹟駕崩，謝朓離開荊州前寫下名作〈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洪順隆認爲這首詩即是謝朓此生「危懼感」<sup>23</sup> 的誕生。謝朓無憂無慮的黃金時光結束了，而這樣的危懼感伴隨著荊州經驗，影響了其後的詩歌風格。

相對於鮑照和謝朓，蕭繹戍守經營荊州多年，應該是南朝時期與荊州地域關聯最緊密的創作者。與蕭綱「詩癖」不甚相同，蕭繹也自幼「聰悟俊朗，天才英發」，<sup>24</sup> 但才華表現於各個方面：「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sup>25</sup> 蕭

21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6〈梁本紀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頁 168。

22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47〈謝朓傳〉，頁 825。

23 洪順隆，《六朝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二十七歲以前是他（謝朓）生命的黃金時代，過著『無憂無慮』的愉快生活。二十七歲追隨隨王赴荊州後，與同僚不諧和，不久受了對方的讒言，那時在〈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中表現了『危懼感』，這是他危懼意識形成的肇端。」頁 212。

24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5〈元帝本紀〉，頁 135。

25 同上註。

繹七歲就封湘東王，而本紀中他與蕭衍的問答，也頗見蕭衍對蕭繹出任藩國所寄託的政治期望：

高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sup>26</sup>

就在此段對話後一年的普通七年（526），十八歲的蕭繹出鎮荊州，此後蕭繹於荊州經營十餘年，「將其一生最豐沛的壯年歲月均投注於斯土斯民」，<sup>27</sup> 太清元年（547），蕭繹經歷江州任職後再度回任荊州刺史，〈示吏民詩〉的「方知江漢士，變為鄒魯俗」，表達了他對於治理荊州的願景。王文進就此認為蕭繹希望將荊楚江陵「建設成一個在文化上足以與建康相對比的城邦」，<sup>28</sup> 由此我們似乎已經可看出蕭繹對荊州江陵的依戀，以及其後堅持不願遷都回建康的執著。太清三年（549）侯景攻破建康，蕭繹又作了一次特殊的政治決策：

（太清）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沖等拜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俟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sup>29</sup>

後來史論家認為蕭繹有意觀望，<sup>30</sup> 但與其如此權謀解讀，倒不如說比起就任督軍或統帥，選擇築柵自圍以守護江陵，才是蕭繹最深切的盼望。若從這個角度來說，蕭繹與荊楚江陵的緊密關聯，以及侯景亂後的遷都之議，都顯得饒富深意了。

關於蕭繹的荊州書寫以及隨遷都之議而來，其人格特質與身分認同探索，得容後再論。然筆者以為：與其用王文進的論點，說蕭繹「為荊州的歷史發展做了一項悲劇性總結」，<sup>31</sup> 倒不如反過來說，蕭繹的荊州書寫和荊州經驗，以及他對於荊楚江陵空間之情有獨鍾，展現了創作者複雜而細膩的心理狀態，也展現了「地方感」如何影響、干擾一個作家的書寫選擇。歷史現實

26 同上註。

27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 16。

28 同上註。

29 唐·李延壽，《南史》，卷 8〈梁元帝本紀〉，頁 234。

30 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臺北：漢京文化公司，2004），頁 453。

31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 17。

或許以悲劇收場，但作品呈現了空間經驗，以及空間與作家相互召喚、彼此建構的軌跡。本文即以三位與荊州各有關聯的作家——鮑照、謝朓和蕭繹為主軸，就其不同面貌的荊州書寫分別敘述。

## 二、經驗的移植：鮑照的荊州書寫

### (一) 鮑照的荊州經驗

大明六年（462），鮑照隨臨海王劉子頊至荊州，黃節在評〈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這首赴荊州詩時說：「上荊州非明遠所願，故詞多悲鬱」，<sup>32</sup> 事實上還都等作同樣顯現路途奔馳的險急、恐懼與感傷，學者已注意到與遊覽詩相比，行旅詩特色在「時空變換的描述上，節奏必然比『遊覽』之作來得快，個中更時常出現千里行舟，驚流急湍的景象」，<sup>33</sup> 加上鮑照格外善於描摹「旅客貧辛，波路壯闊」<sup>34</sup> 之情境，故詩中鮑照還未至荊州，但他對異境的陌生以及羈旅的非情所願，充分展現於詩中：

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扳龍不待翼，附驥絕塵冥。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荊。雲艫掩江汜，千里被連旌。戾戾旦風道，嘈嘈晨鼓鳴。收纜辭帝郊，揚棹發皇京。狐兔懷窟志，犬馬戀主情。撫襟同太息，相顧俱涕零……。<sup>35</sup>

「客行有苦樂」原句來自王粲〈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鮑照改字易句成了「但問客何行」，但就全詩的急促與驚急來說，此行大概是「苦」多於「樂」了。筆者以為「梁珪分楚牧，羽鷁指全荊」值得我們重視，往荊州自然是順水而下，故以「羽鷁」指舟船的鷁首，借代舟行的方向與鮑照此行的方向，同時也借代了他生命轉折與新的未知方向。而「梁珪分楚牧」這

32 黃節，《鮑參軍詩注》，頁 317。

33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1(1999.7): 108。

34 此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本文引自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2693-1。

35 南朝宋·鮑照，〈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詩〉，本文引自清·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 1290。以下所引詩歌皆據此版本，不另註。

句詩，典故出自周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為珪」之事，見於《呂氏春秋》。<sup>36</sup>《史記》在談漢景帝、竇太后和梁孝王關於儲君爭端時，敘述了「削桐為珪」故事的另外一個版本：「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sup>37</sup>

無論封叔虞於唐或封弟於應，都與荊州無關，他改造了這個典故，一方面譬喻的是劉子頊任荊州刺史的現況，另一方面若確如注家所說，鮑照此行情非所願，那麼，「楚牧」表面譬喻的是劉子頊赴任荊州刺史，但背後更隱喻了自己不得不隨之飄零的無奈。水勢騰湧往往令作家感到身處政治與時局的波濤之中，隨之飄零的無奈，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後的「收纜辭帝郊」、「犬馬戀主情」，也就不僅在於離開都城建康而「涕零」，更是出於對預視將來未知前程而悲傷。荊州對鮑照而言，除了未知的異境空間之外，更是未知而傷痛的未來時間之寓象。地理於是成為歷史，果不然，在爾後劉氏宗室相殘中，鮑照在荊州結束其奔波的一生。

相對於此處荊州行的情非所願與感傷，鮑照相對歡快時光是發生於侍奉劉義慶的江州空間，尤其幾首與廬山相關的詩作，廬山的雲霧氤氳，鍾乳碧海，都被鮑照比擬成有如淨土仙鄉。此處舉〈從登香爐峰〉以為對照：

辭宗盛荆夢，登歌美鳧繹。徒收杞梓饒，曾非羽人宅。羅景藹雲烏，沾光扈龍策。御風親列涂，乘山窮禹跡。含嘯對霧岑，延蘿倚峰壁。青冥搖煙樹，穹跨負天石。霜崖滅土膏，金澗測泉脈。旋淵抱星漢，乳竇通海碧……。  
(鮑照，〈從登香爐峰〉)

此詩自古至今評論者眾，方東樹《昭昧詹言》特別提到「荆夢」乃「用宋玉高唐事為切題」，<sup>38</sup>黃節則說「辭宗謂當時文學之士，視屈、宋為盛。歌頌義

36 先秦·呂不韋，《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頁 1156。

37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58〈梁孝王世家〉，頁 2090。

38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171。

慶，比之魯侯」，<sup>39</sup> 江州本屬楚境，而文學集團應制而聯想的「辭宗」自然是襄王宋玉集團，荆楚不僅有神女陽臺的夢幻氣氛，還有文學集團典型於夙昔。

王文進論述鮑照相關的廬山諸作提到：「『廬山』始終與『棲隱』或『仙昇』等意象連結……可見，當文士來到江州，往往受其巖穴窟泉與世隔絕之形勢，與仙境傳說之薰陶，再加上宗教象徵之影響，產生肥遯鳴高與得道成仙的想望」，<sup>40</sup> 而這也呼應了劉苑如曾談過廬山因慧遠而具備的多重「文化屬性與空間記憶」。<sup>41</sup> 但諸多解釋之中，筆者以為蕭馳對山水詩獨特的「興會神到」之解釋，同時代表近年六朝山水書寫的新成果。蕭馳談漁洋對江淹詩的解釋，並引用巴徹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談詩心的內在維度之說：

詩人突破有限的感性和經驗世界，會具有自太虛而俯的宇宙透視……（創作者）不在自經驗世界體味出相對單純色調、氣氛的同質空間；而在虛化經驗世界，以渾涵喚起寥闊，以朦朧撩逗紛繁。<sup>42</sup>

這種藉著詩境的繁複或清空，去突破經驗世界極限，以進入某種朦朧、抽象和虛擬仿真的體驗，確實帶出了過去「巧構形似」、「極聲貌以窮文」所未能觀察到的部分。應景詩不僅只有極度相似與雕琢而已，作者更運用了某種抽象虛幻的技巧。同樣地，Jack W. Chen 談孫綽〈由天臺山賦〉和陶淵明〈讀山海經〉的閱讀與神遊時也提到：「孫綽在穿越異度的空間時，呈現恍惚迷離的感受，而陶潛在閱讀的過程中也顯露這個意圖……跨進一個不需身體在場的世界，並且儘可能去體驗那個世界。」<sup>43</sup> 當然，兩位研究者一談的是描述真山實水的遊覽詩，一談的則是跨足入宗教空間或文本空間的作品，然而它們的構成卻頗為近似。

39 黃節，《鮑參軍詩注》，頁 289。

40 王文進，〈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文與哲》14(2009.6): 72-73。

41 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漢學研究》24.1(2006.6): 77-78。

42 蕭馳，〈南朝詩歌山水書寫中「詩的空間」的營造〉，《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2012.3): 11。

43 Jack W. Chen 著，羅珮瑄譯，〈中國中古時期的閱讀實作與表現〉，收錄於劉苑如主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頁 149-150。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作品，作家將眼前的物色作為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說的「最低限度」（minimum setting），<sup>44</sup> 以此進入一個超越現實的空間，然而這個從真實過渡到迷離、虛化的空間，並非能夠輕易且清楚地敘述出來，得透過詩歌的迷濛、虛幻和特殊造語、詞彙組合來反襯。過去蕭馳談「清曠山水」和佛教的關係，同樣是由此出發。而筆者以為：由此不但能解釋如〈從登香爐峰〉特異的詞句拼貼所形成的仙境迷濛氛圍，更印證了作品與作家以及他們的空間經驗（包括預設的、想像的、當下所處或事後追憶）彼此間相互召喚的關聯。

鮑照確切書寫提到荊州的作品有限，不過本文認為我們能從另外一個層面切入這種羈旅經驗對鮑照的影響。過去談南朝邊塞詩起源有幾種說法，王文進曾提出邊塞詩乃受州府雙軌制的影響——亦即因文人有了旅寓異鄉的經歷，因而得以模擬經驗。鮑照具有荊州經驗，同時他的〈建除詩〉被視為南朝第一首具有邊塞況味的作品，<sup>45</sup> 那麼我們或可以這麼詰問：關於「空間」的經驗是否可以模仿、移植呢？

## （二）空間經驗的移植

在談鮑照的空間經驗時，或可先談他另一首著名的行旅詩〈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這首詩引筆者注意之處在於其繫年。五臣注認為此詩作於自荊州還建康，「照為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從「掩泣望荆流」確實可以作此論。然而方東樹卻認為此乃江州還：「明帝立，子頊拒命，頊敗，為亂兵所殺。此何云還都也？……此蓋從義慶在江州擢國侍郎時也。」<sup>46</sup> 本文不在於考辨繫年，只是更進一步來說，「崩波」的行旅徭役、苦寒經驗確實是可移植、可複製的：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

44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1962), p. 466.

45 鮑照〈建除詩〉為南朝第一首邊塞詩的說法，請參酌劉漢初，〈梁朝邊塞詩小論〉一文，收錄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79。

46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175。

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道。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忽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鮑照，〈上潯陽還都道中作〉）

在方東樹對五臣的反駁中，其實提到另一值得注意的觀點：「五臣注『掩泣望荆流』，憶臨海王也」，亦誤執『荆流』二字。竊意『荆流』『淮甸』，特泛指潯陽地勢耳。所以云『掩泣』，即下思鄉耳」，<sup>47</sup> 從字面來說「侵星赴早路」、「獵獵晚風適」，或「鬱」、「揚」、「翻」、「騰」等關鍵詞句，都表述了旅途的驚挺險急，而此處爭議的「掩泣」和前面的「相顧俱涕零」在情緒抒發上很類似。換言之，行旅無論苦樂，創作者似乎會召喚類似的詞彙、語法以至於情感，其實與作者身處哪處真實空間並沒有絕對的關聯。更別忘了鮑照名篇〈擬行路難〉——正是一典型的征戍閨怨題材，此處舉以下幾段：

……忽見過客問何我，寧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鄉，知君遊宦在此城。我行離邑已萬里，今方羈役去遠征……。（鮑照，〈擬行路難〉之十三）

君不見少壯從軍去，白首流離不得還。故鄉窅窅日夜隔，音塵斷絕阻河關。朔風蕭條白雲飛。胡笳哀急邊氣寒。（鮑照，〈擬行路難〉之十四）

即便擬代或許只是一種遊戲化的經驗模擬，<sup>48</sup> 筆者也並非主張這類驚險奔波的經驗出於矯造、拼貼或應制湊泊，但經驗確實是可以移植、聯想，且無需一再經歷就可以反覆挪用的。即便鮑照或許沒有「邊氣寒」的經驗，然而離家千里、江河關山的度越與波折，「嚴霜慘節，悲風斷肌」，確實出現在鮑照的旅途紀實中，因此這樣的「擬代」就來得更具真實性。

王文進近年來已經對其州府雙關制影響了邊塞詩形成的論述作了部分修正，<sup>49</sup> 將重點轉移到了「處身江南，心懷邊塞」的超越想像，然而鮑照詩中

47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175-176。

48 關於擬代的相關問題，亦可請參閱拙著，〈經驗匱乏者的遊戲——再探南朝邊塞詩成因〉，《漢學研究》29.1(2011.3): 299-302。

49 王文進，〈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州府雙軌制』不僅象徵著六朝文人重要的仕宦歷程，更促使六朝文學在文人遊宦的流動之中，產生特殊的文化美學：其一是文人彼此唱和宴樂之公讌聚會，其次則為四處流轉的飛蓬之悲。」頁 64-65。

的「邊塞氛圍」與荊州經驗似乎也不盡全然無關，像以〈建除詩〉這首全然遊戲觀點的詩來說：

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亘千里，旗鼓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救前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光……。（鮑照，〈建除詩〉）

據《淮南子》〈天文訓〉，「建、除、滿、平」對應「寅、卯、辰、巳」，故此詩與數名、地名詩類似，以鑲嵌詞彙滿足「因難見巧」的創作遊戲心理，但一方面因「建」、「除」的語彙組合召喚了像「滿山填谷」、「平原千里，旗鼓相望」的邊關雄渾意象，二方面這種長距離的移動、身體越界，同樣是鮑照熟悉的經驗，於是乎像「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想像與文獻中的西域圖景和戎狄番邦，快速切換、流轉、跳接，再加上鮑照獨特的詞句鑲嵌與雕飾風格，造就了這首以遊戲為動機，以邊塞為題材，也融合了個人旅寓、遷徙、移動與經驗挪移的作品。

這個觀點有趣之處還在於另外一點，下文將談另外一個與荊州關係密切的作家——蕭繹，同樣擅長遊戲題材，且他和僚臣王褒、庾信也頗熱衷邊塞詩體的製作，而他們以遊戲為動機的邊塞詩歌，最後更成了其生命經歷的某種讖喻。這與荊州經驗是否有關？還是說在荊、江的路程返往中，作家得以比擬、移植某種獨特的經驗？苦寒行旅，辭鄉遠征，這種經驗本身就頗為類似，更何況在偏移中心、遠辭都城的異境，遊戲作為抵抗現實、抵抗世界的意味或許更為明顯了。接著本文即要討論以荊州作為建康對照組的作家——謝朓。

### 三、都城的反視：謝朓的荊州書寫

#### （一）真實與想像的荊州經驗

永明八年（490），謝朓受隨王蕭子隆詔而至荊州，在此之前，他未有至荊州的紀錄。春夜臨江送別之際，竟陵王集團的主要成員——包括王融、沈約、范雲、劉繪等作家皆有賦詩相贈。而謝朓作〈和別沈右率諸君詩〉為答，

詩中他感嘆生命行旅有如江水，屢次爲客。方東樹評三四句「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說「言此身如水，東流無停，思念故鄉陌，將如之何也」，<sup>50</sup>但這句更曲折的寓意或許在於此去隨江而西行，如何能夠東返。這種「往／返」、「他鄉／故鄉」的辯證經常出現在謝朓去還荊州前後的詩中。

除此之外，這首詩雖然提到荊州，「望望荆臺下，歸夢相思夕」，雖然只是泛泛所指，主要在回應沈約贈詩的「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但仍對「荊州」這個異鄉陌土的名勝地景有了初步的想像與典故召喚。「荆臺」典出《說苑》，<sup>51</sup>代表一遊而「遺老忘死」的獨特空間。在爾後的荆楚意象中，荆臺又與神女陽臺、楚臺等意象糾結在一起，所以「荆臺」與「歸夢」構成了一組擺盪於夢境與現實、願歸與忘歸的矛盾語意。

謝朓對荊州認識較深的描述展現在〈臨楚江賦〉，過去日本學者網祐次將這篇賦繫年爲永明八年，即謝朓初至荊州之時；然而洪順隆看法不同，認爲從「憂與憂兮」、「永照於遺簪」等句來看可能是永明十一年將離荊而作，<sup>52</sup>無論何者，都確與荊州相關：

爰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裊裊霜嵐。憂與憂兮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沈西岫，風動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霧隱行雁，霜眇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攢笳兮極浦，弭蘭鷁兮江潯……。<sup>53</sup>

賦中的江水、蘭舟、波濤或沙渚，都建構了荆楚的空間意象，關於空間藉由操演與扮裝呈現文化他者與自身，研究者已有相關論述，<sup>54</sup>而像謝朓〈江上

50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198。

51 東漢·劉向，《說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頁 287。

52 洪順隆校注，《謝宣城集校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頁 72。

53 謝朓，〈臨楚江賦〉，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918。以下所引該書不另註。

54 田曉菲談梁代邊塞詩時，曾提到「文化他者」的觀點：「這是典型的對『文化他者』的建構，而這種對於文化他者的建構反過來是加強自我文化身份的手段。在後文我們將看到，寫作和欣賞南方樂府，體現了同樣的身分建構欲望。」《烽火與流星》，頁

曲〉的末兩句「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透過地名的拼貼與對比，<sup>55</sup> 將江南採蓮的形象橫向移植到了荊楚，勾勒出另一種獨特的空間性。〈臨楚江賦〉篇幅不長，但以巧構形似的寫景句對楚江進行動態描述，而此動態感又出自於作家行旅時「憂／遊」的體驗和時節變化所致（「客之行兮歲已嚴」）。賦中的荊州真實可感，已經不僅只是典故中樂而忘歸、遺老忘死的想像之境。

至於前文已提過，洪順隆認為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是他「危懼感」的起源。但筆者更注意的是這首詩中——建康與荊州以對照的形式呈現出來，荊／揚兩地的對稱與對峙格外明顯：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揚／荊、建康／江陵的對照並非是一個新的地景對比或距離落差，此敘述策略可能與西曲歌有關，如劉誕〈襄陽樂〉「乘星冒風流，還儂揚州去」，<sup>56</sup> 或釋寶月〈估客樂〉「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sup>57</sup> 這種依江水順逆而往返的旅途，以荊雍與揚州作為對比的空間感，成為荊州地景的書寫素材之一。而《南齊書》引了謝朓這首詩後四句「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以此作為謝朓對西府善意愛賞和惡意嫉妒的總結。感傷、恐懼、悵然與旅途中前後的距離感，混雜融合在一起。過去評論家對此詩推崇備至，楊慎稱「雄壓千古」；方東樹說「何云：『壓卷。』愚謂極才思情文之壯，縱橫跌宕，悲慨淋漓，空前絕後」，<sup>58</sup> 但除了如「金波麗鳩鵲」、「風雲有鳥路」等名句外，評論家也都注意到「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和「驅車鼎門外，

252。其後她談梁代〈採蓮曲〉時，又將〈採蓮曲〉視為南方建構自我文化符號的方法。相關評述在拙著，〈經驗匱乏者的遊戲——再探南朝邊塞詩成因〉曾經提及，頁281-312。

55 類似的例證還有「易陽春草出，踟躕日已暮。蓮葉尚田田，淇水不可渡」的「易陽」和「淇水」，也是一樣以實際地景來建構「江南」的特色。

56 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6），頁703。

57 同上註，頁700。

58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191。

思見昭丘陽」兩聯巧妙的空間對照與抽象。<sup>59</sup>

事實上，作者自荊返京，身體正處於兩空間之間的中介狀態。實際的旅程進度或許是一回事，但從創作者的心靈空間與感覺距離而言，「關山」近在眼前，代表回到荊州的「返路」遠了。這當然是氣氛美學的進一步展演，<sup>60</sup>但可以想像的是，在旅途驅馳的過程中，這兩端都是不容易「望」的，張玉穀認為「秋河」六句比附建康而言「關山近」，「驅車」六句象徵西府而言「返路長」，此說固然沒錯，但謝朓的空間跳躍遠比譬喻走的更遠。從「引領見京室」開始寫的都是身歸都城後的想像與「既視感」，且層層深入，心靈的遠眺已經來到「鳩鵲」、「建章」，卻隨著通過鼎門這樣的入城儀式而受到阻絕。也在此同時，作者召喚了「昭丘」這個出於〈登樓賦〉的意象。<sup>61</sup>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典故拼貼而已，王粲滯留紀郢，爲了消憂而登樓，然而對謝朓而言，遠望或既視並非思鄉當歸，而是想起荊州的愛恨時光。於是乎，這場「往」與「來」，「近」和「遠」的空間辯證就顯得格外迂迴而曲折了。

這首詩透過上下與前後的追憶／既視，對照了建康與西府的區隔。而「何況隔兩鄉」其實說得很明白，謝朓（對西府同僚）宣稱自己是回不去了，「江漢限無梁」從古詩「河水深無梁」、曹丕「欲濟河無梁」脫胎而來，<sup>62</sup>謝朓終究是不得返還是不願返？是慶幸還是遺恨？或許還有討論空間，但「荊州」

59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續修四庫全書》第 15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秋河六句，頂關山近來，言京室不遠也，為眼前之景。驅車六句，頂返路長來，言西府難還也，為意中之情。」頁 77；清·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望京一段，眷戀不已；秋河六語，應關山近，驅車六語，應返路長。」頁 110。

60 （法）伯梅（Gernot Böhme）著，谷心鵬等譯，〈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氣氛是一種空間，就是通過物、人或各種環境組合的在場（及其外射作用）所薰染（tingiert）的空間。氣氛本身是某物的在場領域，即氣氛在空間裡的實存……氣氛是從物、人或兩者的各種組合生發開來而形成的。」《當代》188(2003.4): 20。

61 東漢·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文選》李善引〈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見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頁 490。

62 〈古詩〉：「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引自《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336；曹丕〈雜詩〉：「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頁 401。

對謝朓而言到底是「返」還是「去」？在末句「寥廓高翔」終究能讀出逃離羅網的意味，接賞流連與憂讒畏譏，成了謝朓難以抹滅的兩種荊州經驗，那麼日後謝朓又如何對荊州興發懷想？

## (二) 懷想荊州

永明十一年（493），謝朓自荊州還都，明帝蕭鸞繼位後他轉任中書郎，建武二年（495）「出為宣城太守」，<sup>63</sup>宣城位於南豫州，為其時大郡，謝朓或許並不像蕭繹與荊楚情感深厚屢屢掛念、緬懷，但我們從他與幾位前往荊州赴任故友的贈答詩中，還是可以側面推測荊州三年的時光對他的記憶、感受與懷想。筆者以為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謝朓為數不多的長篇詩〈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這首詩繫年未定，有稱荊州時作、也有稱宣城時作，但從「從賞乖纓弁」可推測謝朓此詩乃為遙贈伏曼容。武昌城為孫權故都，《三國志》稱：「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sup>64</sup>

關於此詩，評論家大都注意到其書寫風格的獨特性，方東樹說此詩與〈和王著作融八公山詩〉皆「典制大題」，<sup>65</sup>洪順隆說此詩「乃宣城力作」。<sup>66</sup>詩分前後兩段，先寫孫權雄圖霸業，後寫興衰對照並答伏詩，此處節錄後段與伏曼容的應和：

……參差世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睭。幽客滯江皋，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綯。于役倘有期，鄂渚同遊行。（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過去詩評大多認為「寂寞市朝變」作為轉折乃本詩精髓，而「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頗類似「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鮑照，〈蕪城賦〉）所描繪的荒涼與今昔對比氣氛，孫月峰評此詩亦有「盛陳

63 梁·蕭子顯，《南齊書》，卷 47〈謝朓傳〉，頁 826。

64 晉·陳壽，《三國志》，卷 47〈吳主孫權傳〉：「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頁 1121。

65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200。

66 洪順隆校注，《謝宣城集校注》，頁 381。

往事，頗似賦」<sup>67</sup>的說法。謝朓於荊州時未必有遊武昌鄂渚的經驗，然而孫權故城代表的東吳霸業，仿若一瞬即荒蕪，徒留「故林衰木」、「荒池秋草」與繁榮時的「葳蕤」、「蔥蒨」相對應。如果說「懷古」也是有機的、有選擇性的創作行為，那麼從南北家國的大環境來看，這專屬於南方、屬於荊楚、關於「坐斷東南戰未休」的雄圖霸業，也召喚出了南朝作家獨有的感傷。

在此詩中謝朓以「幽客滯江皋」謂己，因不得與伏曼容共遊而遺憾，何義門說「『纓弁』亦切楚事」，此指不甚明確，或許指可上溯自楚騷的典故體系，然而進一步來說，〈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顯然在典故、在觀點，在國族認同的傾向來說，都隱喻了一層南方的、荊州的地方感。

而另外一首〈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為謝朓於宣城送別范雲所作，這同樣召喚了謝朓過去的荊州經驗。若對比謝朓其他的餞宴送別詩——如〈答王世子〉、〈和王長史臥病〉、〈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和王著作融八公山〉就能推測，他以「伏武昌」、「范零陵」稱兩人，與他們即將或已前往荊州空間任職頗有關連。一來詩中他召喚荊楚典故意象，二來謝朓也親歷荊州所在的遠方，也能掌握其距離、空間繪測代表的意義，因此，以荊州地名作職銜以稱兩人，實則從題目就召喚出謝朓對荊州的記憶。除外，詩中運用另外一套荊州典故，開頭四句獨特的書寫格局，已為注家所重：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謝朓，〈新亭渚別范零陵雲詩〉）

張玉穀說這首詩前六句寫范雲所將往之地，而認為最後一聯甚妙，「連范亦拖在內，折到『徒』抱『離憂』……『江上』字，則又補點題中新亭渚也」，<sup>68</sup>對都城建康來說，「江水」代表的是長江天險；但對國之西鄰的荊雍地帶而言，長江漢水代表的是波瀾驚挺、溯流上下的行旅返往。這同時也呼應了此詩對往荊州移動時的動態建構。從荊楚空間，即范雲將去而未行之境作為詩的開頭，此寫法頗特殊。方東樹稱讚開頭四句「似有神助」，<sup>69</sup>洪順隆說首四句「尤

67 于光華編，《評注昭明文選》（臺北：學海出版社，1982），頁 118。

68 張玉穀，《古詩賞析》，頁 77。

69 方東樹，《昭昧詹言》，頁 193。

不易得」，<sup>70</sup>「洞庭」、「瀟湘」的典故出自皇帝張咸池樂、娥皇女英居所，寄寓的自然是湘楚自古以來的神秘仙境傳說。

而「洞庭」、「瀟湘」除了是范雲溯江而上的必經之地，更是謝朓熟悉的荊州空間，所以他從自身熟悉的場所作為開頭。「雲去蒼梧野」應有雙關指范雲之意，且「蒼梧」更在零陵之南，超過了謝朓和范雲所可能親身履跡之處，故稱「雲去」；同時行者將去，往者得返，一如江漢之東流入海，故稱「水還」。這一去一往，一零陵一建康，一荊州一東海的對照，仍然表述了前文提到的——謝朓對都城與荊州的對照而映襯的書寫特色。而也因為謝朓的這首詩，「洞庭張樂」這個典故就和謝朓的清麗詩風結合，成為一整體形象，造就了後代「湖連張樂地」、「詩傳謝朓清」<sup>71</sup>這樣的詩句。荊州三年時光，不僅作為謝朓「危懼感」的開始，也成為他將來對照建康、宣城的地景，成為獨特造語和典故召喚的源頭。

象徵「荊州」的諸多意象和隸事，如河漢水勢湍急、仙境雲雨飄渺的典故其實不少，除了這邊所提及的洞庭張樂，荊臺遺老，以及「一柱觀」或「陽臺雲雨」等屢次被提及之外，更可以參看另外一個與荊州淵源甚深，甚至於荊州寫下讖詩以及家國寓言的作家——蕭繹。

#### 四、家國的讖象 (omen)：蕭繹的荊州書寫

##### (一) 遷都之議與蕭繹的「荊州情結」

梁天監十三年（514），蕭繹被封為湘東王，普通七年（526），蕭繹赴任荊州刺史，中大通四年（532）蕭繹任平西將軍，後領鎮西將軍，經營荊州十餘年。天正元年（552）他於江陵稱帝，直到兩年後的承聖三年（554）西魏攻破江陵為止。蕭繹不僅掌握長江中游的軍權，更「起州學宣尼廟。嘗置

70 洪順隆校注，《謝宣城集校注》，頁 237。

71 李白，〈送儲邕之武昌〉：「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為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為楚人重，詩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曲，寄入櫂歌聲。」引自清·董誥，《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177，頁 1805。

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sup>72</sup> 努力推動儒學。

無論從政治局勢、遷都爭議或文學作品等不同面向，都可以看出蕭繹與荊州的密切連結，然而至於所謂的「荊州情結」，則須從 1. 環境局勢與 2. 都城象徵來談。此處先看侯景亂後，朝臣對於是否遷都回建康的爭論焦點：

時朝議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荊、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為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遷都。<sup>73</sup>

從相關爭論來看，這場爭議大概有兩層面向，其一是「東人／西人」之爭，這與世族地域關係密切；其二則是周弘正、王褒提到庶民認知中的「建康王氣」和蕭繹自身的「荊州情結」之爭。而此兩層考量又盤根錯節、密不可分。從地理環境現狀或政治局勢來衡量，建康城於侯景亂後遭到大規模破壞，居民更八九不存：「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sup>74</sup> 且建康以北的州郡盡入北朝，僅以長江與北方政權為界，確實也有不再適合作為都城的時空環境。

但相對來說，當時梁州、益州已併入西魏，而襄陽亦也脫離了南朝控制範圍，即便蕭繹經營多年，然而現狀即是江陵成孤立之勢。在兩城皆有缺點的狀況下，最終爭議還是來自於「東人」與「西人」的鄉土地域之爭，只是兩造都選擇了「王氣」這個歷史悠久卻又讓蕭繹頗為服膺的說法：

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慄、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戶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慄及御史中丞劉懿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帝觀之慨然而謂朝臣文武曰：「吾觀玄象，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sup>75</sup>

72 唐·李延壽，《南史》，卷 8〈梁元帝本紀〉，頁 243。

73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 24〈周弘正列傳〉，頁 309。

74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162〈梁紀〉，頁 5008。

75 唐·李延壽，《南史》，卷 8〈梁元帝本紀〉，頁 244。

這讓我們想到當年王導力排眾議的「金陵王氣」，只是在這次，「王氣」成了相反的概念，見證了都城與家國毀滅的感傷。而從上述這段筆者以為更重要的是：蕭繹對超現實徵兆的信仰特別信服。<sup>76</sup>除了宗懷、劉懿的「洲滿百」，<sup>77</sup>及蕭繹自己「夜觀玄象」，發現「歲星在井，熒惑守心」<sup>78</sup>的占星術式外，顏之推也有提到蕭繹與西魏對壘時所施展的「厭勝」<sup>79</sup>咒術：

竚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嘆息知必敗）。<sup>80</sup>

即便結果是失敗的，是徒勞的，是所謂「為荊州的歷史發展做了一項悲劇性總結」，<sup>81</sup>但蕭繹對吉凶運數的豁達，力圖振作的努力，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勝敗與局勢的預知、感應，都顯示出他獨特的浪漫性格與對超自然力量的服膺。這讓他成為一個南朝時期非常特殊的政治家與詩人。或許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在國家瀕臨覆滅前夕，蕭繹仍選擇相信超自然的徵兆或儀式，未免太荒誕；然而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似乎蕭繹的詩歌某程度證明了文學作品能夠成為世界「讖象」（omen）的這個說法。

關於讖象，容後論及蕭繹詩時再談。總結遷都之議，從現實地理與局勢環境來說，江陵與建康各有其缺陷，遷都未必能確保延續梁代國祚。從都城象徵來說，東人所說的「未見輿駕入建鄴……未名天子」，稱的是金陵王氣；西人宗懷、劉懿主張的「建鄴王氣已盡」，同樣從反面論述金陵王氣。最後決定的蕭繹顯然依憑了自身的荊州情結，加上他又是一個如此服膺超現實現象的君主，這樣對空間的偏執和浪漫，與荊州自古隱含的朦朧夢幻多少也有些關聯。蕭繹拒絕遷都這件事，還有一個感傷卻又壯烈的尾聲：

76 「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賓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同上註，頁 245。

77 同上註。

78 同上註，頁 244。

79 關於「厭勝」相關巫術等論題，請參酌黃靖惠，「唐代詩歌中的節日厭勝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9-36。

80 顏之推，〈觀我生賦〉，《顏氏家訓集解》，頁 600-601。

81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 19。

及魏軍逼，閩人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有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於人中。<sup>82</sup>

從後見之明來說，出於對一空間的偏好，造就了整個國家覆滅的局勢，這當然是錯誤的，但人對空間、對地域的複雜牽絆，似乎也不能輕易的化約。「曩實吾意」一句，將蕭繹的荊州情結全然表明了。

過去歷史學者對蕭繹的政治意圖有些揣想：「他（蕭繹）聽到臺城被圍，並不急於派遣大軍救援父兄，相反地卻希望臺城早日陷落，他的父兄早日被殺，然後讓他來作皇帝」，<sup>83</sup> 筆者並非全然否認梁王室內鬥的解釋，只是若從「荊州情結」來看，這顯然將私密的、心靈的體會用政治或權力的框架給來解釋了。除了遷都爭議之外，蕭繹的詩歌也頗能表現其與荊州的連結，以及表現出詩歌如何作為現實世界的預兆。

## （二）文學作為預言的可能

前面已經談到過荊州的相關典故，而從這些典故——神女薦枕、楚騷憂患、荊臺遺老……它們都有著某種夢幻、迷茫與感性的意象。傅飛嵐論杜光庭《錄異記》時曾有個說法，認為《錄異記》提到「蜀地」的神蹟、異境，是為確保（後蜀）王氏政權對蜀地的有效統治力。<sup>84</sup> 但荊州空間的特異、仙靈典故與記載、意象，顯然有另外一種效果，製造出荊州空間獨特而離世的去中心感。往後，這樣的地方感也就成為作家身處、緬懷或敘事荊楚時不能分割的「文化屬性」與「人文地景」。<sup>85</sup>

而從另一方面來說，蕭繹作為君主或作為詩人，其性格中獨特的執迷、浪漫與超自然的信仰，讓他展現出對於荊州的過度熱忱與依戀。他的這種情感從幾首以荊州為題的詩——〈別荊州吏民〉、〈去丹陽尹荊州詩〉、〈後臨荊州詩〉、〈別荊州吏民二首〉、〈出江陵縣還詩〉等即可看出來。王文進總結這些詩提到：「觀其（蕭繹）被徵入朝，惜別依依；江州望楚，千里遙寄，可謂

82 唐·李延壽，《南史》，卷 8〈梁元帝本紀〉，頁 244。

83 王仲犛，《魏晉南北朝史》，頁 453。

84 參見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蜀——杜光庭《錄異記》裡的「聖地」〉，收錄於林富士、傅飛嵐編，《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 350-355。

85 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頁 78。

一別而三致意……蕭繹在長期的浸潤之中，根本就將荊州視為隸屬一己的王國。」<sup>86</sup> 這些詩歌當然隱含了政治性論述，但其間的抒情性、對荊州的獨特地方感書寫同樣明顯。我們以陰鏗、朱超於江州百花亭遠眺荆楚的共作為例：

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晴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春酒，遙勸陽臺人。（蕭繹，〈登江州百花亭懷望荆楚詩〉）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暮將朝。（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

亭高登望極，春心遠近同。莫恨荆臺隱，雲行不礙空。柳色浮新翠，蘭心帶淺紅。若因鵬舉便，重上龍門中。（朱超，〈奉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

在這組詩中，蕭繹與集團成員對於荊州的緬懷（懷）與觀看（望）有著更複雜、更深刻的意義。真實視覺的極限能否「千里」或「望楚津」或許不是最重要的，就像巴徹拉說的：詩成爲一種無邊際的內心維度。<sup>87</sup> 除了可見或不可見、想像或現實之外，細膩意象又與背後的感性與抒情相關。在詩中，陰鏗的「風煙望似接」、朱超的「雲行不礙空」，以及蕭繹另外一首〈別荊州吏民詩〉的「莫言江漢遠，煙霞隔數千」，因爲有風煙、雲霧、霞光，距離和視野的遠近得以被重新定義。

於是，除去實際的科學距離和地理學知識之後，詩人與空間以含情脈脈的抒情關係彼此依存。或更明確來說——真實目力的眺望必然是有限度的，所以這群懷念荊州的作家無論看得見或看不見，他們志不在「望」而在於「懷」，心靈的距離可以無限伸縮，「莫恨荆臺隱，雲行不礙空」，梅洛龐蒂曾舉過一個「想像遠方終於相交的鐵軌」<sup>88</sup> 的譬喻，世界因觀看者而存在，於是視角的陳述更進一步將主體存在的意義彰顯出來。

若順著詩的內容來追溯，蕭繹、陰鏗所「看到」的荆楚不僅是地理的，

86 王文進，「荆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 18-19。

87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p. 198-199.

88 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著，龔卓軍譯，《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鐵路在影像上是平行線在漸漸接近：鐵軌合而為一。』鐵軌相交在一點，其實又不相交，它們相交在一點是『為了』保持在彼端點的等距，世界順著我的視角呈現，是為了獨立於我而存在，它為我而存在，成其為世界而存在」，頁 134。

更是典故的、是歷史的、是想像的。陽臺神女暮去朝來、化雲爲雨；以及荆臺令遊者遺老忘死……這些典故在詩中不僅是單純拼接與雕飾的意義，其背後迷濛、夢幻和神秘的本事、多情旖旎的春夢，成了蕭繹與僚臣嚮往的荆楚符號。蕭繹另外喜歡召喚的典故是王粲與其〈登樓賦〉：

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蕭繹，〈別荊州吏民〉）

王文進認爲這首詩的「麾軍時舉扇」仿效的是諸葛孔明，<sup>89</sup> 前文也提過蕭繹「常自比諸葛亮、桓溫」，若這句比附的對象是孔明，那這首詩自然含有軍事與家國的寓意，不過與孔明羽扇麾軍，對偶的，卻是另一個流寓荊州紀郢、遠望思鄉的作家王粲。王粲與孔明或許是兩種類型，也象徵了蕭繹理想中追尋的兩種人物類型。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首詩重點放在「別荊州」，依此詩來看，蕭繹即將順流而下回到建康，但一切觀看與行動——「風轉七星旂」、「向解青絲纜」，在風中飄盪的旌旗和船帆、解開船纜以移舟等等——都顯得異常地緩慢。蕭繹對於荊州而言是一地之守（「玉節居分陝」），是統帥（孔明）卻又同時是一個詩人（王粲），「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sup>90</sup> 同時也表現出蕭繹對此兩種身分的期望與認同。於是我們可以說，蕭繹一方面書寫了對荊州深切的情感依戀，一方面又被荊州的典故與歷史召喚出不同的期望與人格特質。在地理意義上，蕭繹旅居荊州多年；在文學意義上，荊州的邊陲氛圍也給了他更多自由書寫空間，就像鮑照將行旅經驗移植那樣，蕭繹如今的作品包括一些宮體詩、數量頗豐的應制與詠物詩，更寫了大量語文遊戲的詩。<sup>91</sup> 這些作品未必盡是於荊州時期所寫，但理應與他的荊州經驗有關。

宇文所安有一個說法，認爲詩歌能夠作爲現實世界的徵兆——即「讖象」：「世界在此是一個廣闊的、閃爍不定的讖象（omenscape），而且詩人是世界讖象的閱讀者。正如異兆對主政者揭示出社會的情勢一樣，世界的讖象

89 王文進，「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 16。

90 唐·李延壽，《南史》，卷 8〈梁元帝本紀〉，頁 243。

91 南朝盛行「數名」或「地名」一類遊戲詩，作家中又以蕭繹保留最多此題材詩歌。

是被詩人感受到的當下的真實現象。」<sup>92</sup> 蕭馳則說漢代讖緯家即有相關的說法：「『詩者……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敘四始，羅列五際』。捨迷信成份不論，不妨引為說明詩的具象與抽象之間『讖象』或象徵的實質……其本身是不可道說的。」<sup>93</sup> 舊說即有「禹貢治河」、「洪範察變」之類的通經致用、天人感應，但就蕭繹的例子，讖象似乎還能延伸成爲一種預言。由於詩人具備格外敏感的心靈，而詩本身也更脫離詩人的經驗現實而進入超現實——詩歌於是有了對當下與未來的預言意義。

關於「讖象」以及詩歌的預言性，蕭繹集團還有一著名的例證，起因來自於蕭繹、王褒和庾信同題共作的樂府〈燕歌行〉。這一組共作樂府不但於江陵所寫，<sup>94</sup> 且與其後江陵城破有密切關係。在令狐德棻《周書》裡，特別提到了這幾首蕭繹和僚臣的共作：

王師攻其外柵，城（江陵）陷，（王）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眾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為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sup>95</sup>

當然，這一則記載的後半段，出於令狐德棻事後諸葛的評斷，這多少有些田曉菲所說的「征服者」的觀點，有些對南方文學的輕蔑，以及對蕭繹集團這次擬代遊戲與哀苦晚景的幸災樂禍。不過在此敘述中，這次擬代〈燕歌行〉的遊藝，成爲了蕭繹和王褒生命的註腳，「至此方驗」。或許從經驗主義來說，作家無法憑空去模擬思婦的閨怨情懷或燕地苦寒、薊門風塵，但遠離都城與國家中心換來的荊州經驗，讓幾個作家得以想像他們自己的邊塞經驗。這組同題共作的〈燕歌行〉如下：

自從昔別春燕分，經年一去不相聞。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屬國小婦猶年少，羽林輕騎數征行。遙聞陌頭採桑曲，猶勝邊地

92 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44.

93 蕭馳，〈南朝詩歌山水書寫中「詩的空間」的營造〉，頁 33。

94 王文進曾提到：「庾信〈燕歌行〉成於江陵時期，而其此後的邊塞即為江陵風格的延伸。」氏著，〈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頁 230。

95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41 〈王褒傳〉，頁 730-731。

胡笳聲。胡笳向暮使人泣，長望閨中空佇立。（王褒，〈燕歌行〉）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前月似  
 蛾。……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春日上升臺。乍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  
 似行杯。沙汀夜鶴嘯羈雌，妾心無趣坐傷離。（蕭繹，〈燕歌行〉）  
 代北雲氣晝昏昏，千里飛蓬無復根。寒鴈嗷嗷渡遼水，桑葉紛紛落薊門。  
 晉陽山頭無箭竹。疎勒城中乏水源。屬國征戍久離居。陽關音信絕能疎。  
 願得魯連飛一箭。持寄思歸燕將書。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  
 紋……。（庾信，〈燕歌行〉）

過去學者曾定義邊塞為相對中原的「極西」和「極北」，那麼〈燕歌行〉所聚  
 焦的「東北」顯然有題材新變的用意。<sup>96</sup> 曹丕〈燕歌行〉原詩與邊塞無涉，  
 寫的是思婦閨情，王褒等人〈燕歌行〉延續了這個題材，卻加入了屬於「燕  
 地」的邊塞氛圍。按照《周書》所說，王褒之作在先，其詩緣題而作，將西  
 域大漠的邊塞，移植到了襄平、薊門的河北情懷，用征夫視角觀看江南。而  
 蕭繹顯然刻意別出新體，同樣以「燕」而興題，模擬遼東少婦視角來重寫這  
 次春閨相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在樂府傳統中原本  
 應獨守空床、盼君早歸的南方思婦，經過空間移植嫁接到了「遼東」——即  
 「燕歌」的所在地，這顯然是某種文字遊戲的延伸與緣題作詩的想像。

這樣的創作內涵，與蕭繹本身擅長遊戲體裁的特質不無關聯，就像前面  
 提到嘗試大量邊塞風格的鮑照。一方面蕭繹與僚臣遊戲化的詩歌扮裝，歪打  
 正著成為讖象，預視了他們未來的離散情境；二方面放進本文的脈絡來說，  
 荊州經驗本身就是一種去中心的流寓經驗，而此經驗一來滋養了遊戲體的書  
 寫土壤，二來給了創作者模擬、聯想的整體氛圍。宇文所安在談王昌齡的邊  
 塞擬作時會有個說法：認為王昌齡對虛構手法的興趣，來自於虛構模擬可以  
 讓他獲得某程度的自由。<sup>97</sup>

96 譚優學，〈邊塞詩泛論〉，《唐代邊塞詩研究文選粹》（蘭州：甘肅出版社，1988）：「（邊塞指）長城一線，及隴西河右的邊塞之地」，頁 2；而田曉菲《烽火與流星》根據此意見，認為「遼西和燕地也在邊塞詩中佔有一席之地」，頁 252。

97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賈晉華譯，《盛唐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王昌齡是一位邊塞詩名家，這一點使得許多學者推測他確曾在邊塞軍幕中任職。但是，最可靠的證據卻表明王昌齡詩中的中亞是詩歌傳統和他自己想像的結合物，……設想王昌齡曾在邊塞軍幕中任職，就如同設想他是皇帝後宮的宮女一樣荒唐無

把這個說法反過來說，在去中心的空間，自由心靈更容易受到遊戲化題材召喚。於是乎，與其說「至此方驗」，倒不如說離散的集體記憶早與荊州空間有了連結，而蕭繹在空間、家國、認同與地方感變動不居的狀況下，將詩歌作為他們這一代創作者預言的方式——甚至無需詩歌——每個心靈敏銳的南朝創作者，都能感受他們所身處時代之危如累卵。於是遷徙、毀滅、思念與感傷，就成了他們詩歌所記載的內容而留存了下來，卻意外被北方史學家倒果為因地奚落了一番。

## 五、結語：創作者與地方感的相互召喚

### （一）鮑照：擬代經驗與荊州經驗

從鮑照生平來看，於江州任劉義慶幕僚應是他較順遂的時期，而相對來說，注家一般認為赴任荊州非鮑照情願，所以辭多感傷，然而無論行旅荊州或江州，鮑照皆擅長描寫旅途過程的艱辛、奔波、倉促，「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而這樣的經驗於是也與他邊塞樂府的詩歌創作有關——包括〈行路難〉、〈建除詩〉中所勾勒的邊塞風格——羈旅者的苦寒、千里驅騁的場景跳接，作者得以透過移動、奔波的經驗進行聯想。從這個角度來說，王文進過去認為的「州府雙軌制」下的荊雍經驗造就了南朝邊塞詩這個說法，其實也仍說得通。但筆者認為可以退一步來講：鮑照有江、荊州的行旅經驗，而詩歌作品無論寫作先後，這種預設或親身的經驗都成為模擬經驗的背景。那麼我們當然也可以說：荊州空間的召喚，反過來干涉或成就了作家的書寫內涵。

### （二）謝朓：荊州作為建康對照組

謝朓於荊州的時間不長，但從開始的流連晤對到其後招致讒言，洪順隆認為自荊州返建康的〈贈西府同僚〉成為謝朓「危懼感」的起源。但筆者以

---

稽，……王昌齡在盛唐詩的重要地位，部分正來自他對虛構手法的興趣，以及由此獲得的自由。此外，他的作品的廣泛流行，也表明了同時代人對於非應景詩的渴望。」頁 155。

爲更重要的在於詩中謝朓如何呈現「關山近 / 返路長」的荊州與建康對照。這種荊 / 揚的既視、預視和距離感的拉鋸，早出現在西曲中，像「人言襄陽樂」、「還儂揚州去」之對舉襯托。然而謝朓更巧妙地將遙遠如南北極的兩軸空間並陳，於地方感的輕快之中舉出沈重的、回不去的感傷。這直接影響到謝朓日後的懷想荊州。荊州成了神話仙鄉，「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關於荊州的「陽臺神女」、「遺老忘死」，隨著謝朓的回不去與緬懷，而進入了荊州書寫的範疇之中。

### (三) 蕭繹：逃避現實的私我王國

蕭繹一方面長期經營荊州，荊楚的習俗典故傳說都成爲他與其僚臣詩歌的核心。除此之外，荊州江陵對之而言更是一重要的政治地景。蕭繹具有浪漫、執著、服膺超自然力量的性格，包括占星、厭勝，而荊州又是一個充滿神話仙靈傳說的空間。除了詩歌中描寫的荊州，蕭繹的荊州情結更展現在稱帝、遷都一連串的政治選擇，這同樣是性格與空間相互影響的結果，最明顯即下段：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之爲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太清末，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sup>98</sup>

從「讖象」的角度來說，詩歌一如天象地形，經過創作者的敏銳感受而被記載下來。蕭繹和僚臣作過〈燕歌行〉這樣的預言詩，也有〈星名〉、〈將軍名〉、〈針穴名〉一連串的遊戲詩，這種虛構與逃脫一方面表現了他的性格；二方面也因荊州所提供的逃逸空間而更爲強化。或許如研究者所說的：蕭繹的執迷、浪漫與荊州情結，造就了「荊州悲劇性的總結」，但筆者進一步以爲他讓荊州成了私我的自由而神秘的小王國。

從上述的討論，荊州對南朝而言，不僅是一實際存在的地理州郡，更對不同身分、階級的作者有著不同的意義與召喚。過去我們將南朝視爲一個整體，然而對南朝當時作者而言，東西的區別很明確，關於荊州的記憶與書寫

---

98 唐·李延壽，《南史》，卷 8〈梁元帝本紀〉，頁 246。

也代表了南朝文學的內在區別。因此本文聚焦談南朝作家的「荊州書寫」，希望能開展南朝文學另外一個側面與可能性。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先秦·呂不韋，《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西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東漢·劉向，《說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 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6。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董誥，《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清·永瑤等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續修四庫全書》第1591-15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 清·逢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 清·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2006。

### 二、近人論著

- 丁福林 2009 《鮑照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

- 于光華編 1982 《評注昭明文選》，臺北：學海出版社。
- 王文進 1978 「荊雍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王文進 1999 〈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1(1999.7): 103-114。
- 王文進 2000 《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
- 王文進 2008 《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
- 王文進 2009 〈江州地帶與南朝詩歌的關係〉，《文與哲》14(2009.6): 55-90。
- 王仲羣 2004 《魏晉南北朝史》，臺北：漢京文化公司。
- (美) 田曉菲 2009 《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美)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譯 2007 《盛唐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法) 伯梅 (Gernot Böhme) 著，谷心鵬等譯 2003 〈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188(2003.4): 10-33。
- 吳丕積 1982 《鮑照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林富士、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編 1999 《遺跡崇拜與聖者崇拜：中國聖者傳記與地域史的材料》，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祁立峰 2011 〈經驗匱乏者的遊戲——再探南朝邊塞詩成因〉，《漢學研究》29.1(2011.3): 281-312。
- (美) 柯蘭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 2003 《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段熙仲 1981 〈鮑照五題〉，《文學遺產》1981.4: 107-113。
- 洪順隆校注 1969 《謝宣城集校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洪順隆 1985 《六朝詩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 (法) 梅洛龐蒂 (Merleau-Ponty) 著，龔卓軍譯 2007 《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 黃節 2008 《鮑參軍詩注》，北京：中華書局。
- 黃靖惠 2009 「唐代詩歌中的節日厭勝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劉苑如 2006 〈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漢學研究》24.1(2006.6): 71-106。
- 劉漢初 1994 〈梁朝邊塞詩小論〉，收錄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69-82。

- 蕭 馳 2012 〈南朝詩歌山水書寫中「詩的空間」的營造〉，《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0(2012.3): 1-40。
- 譚優學 1988 〈邊塞詩泛論〉，《唐代邊塞詩研究文選粹》，蘭州：甘肅出版社。
- 嚴耕望 1961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Bachelard, Gaston.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 Chen, Jack W. 著，羅珮瑄譯 2012 〈中國中古時期的閱讀實作與表現〉，收錄於劉苑如主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 132-156。
-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by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 Owen, Stephen (宇文所安). 1985.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The West Country: A Study on the Jingzhou Writing of Bao Zhao, Xie Tiao, and Xiao Yi

Chi Li-feng\*

### Abstract

In the past, researchers have mainly concerned themselves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terature. In the south,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and custom produced the different literary styles of Jingzhou 荊州 and Yangzhou 揚州. This study discusses Jingzhou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writers, Bao Zhao 鮑照, Xie Tiao 謝朓, and Xiao Yi 蕭繹, who once served as officials or lived in Jingzhou. Bao Zhao's experiences travelling through Jingzhou provided him with writing material that he could graft onto frontier fortress-style *yuefu* 樂府 poetry. To Xie Tiao, Jingzhou represents a spatial contrast with the capital Jiankang 建康. In later writings he often recalls Jingzhou with affection, his memories of living there frequently summoned up by the literary allusions he employs. Last of all, this paper examines Xiao Yi, who combines the myths and legends of Jingzhou with a romantic sentiment to create his Jingzhou complex: he takes Jingzhou and forges it into his own private fantasy kingdom.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discussion of Jingzhou writing will help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north-south divide narrative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terature research by supplementing an east-west dimension.

**Keywords:**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Jingzhou 荊州, Bao Zhao 鮑照, Xie Tiao 謝朓, Xiao Yi 蕭繹

---

\* Chi Li-fe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